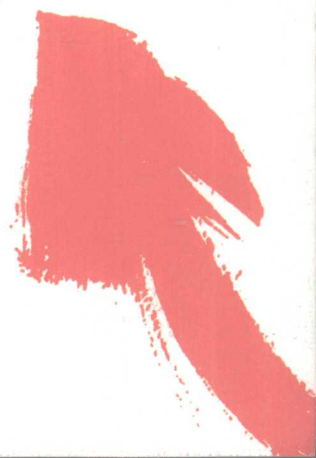


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s Community?
—From Innis to McLuhan

李洁 著



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

ACADEMIC SER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JINAN UNIVERSITY



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 / 李洁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6

(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

ISBN 978 - 7 - 81135 - 310 - 5

I. 传… II. 李… III. 传播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12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 60 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程。

1946 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1949 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 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 1960 年开办新闻学专业。1970 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入华南师范大学。1978 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 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 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 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2001 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 1986 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之一，2001 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 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 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建成本一硕一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 2006 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 2007 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为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特别是 2006 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型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励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

在当代中国学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单位的学科建设要有所建树，

必须发挥优势，强化特色，开拓创新。为此，凝练学科方向至关重要。经过多次讨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明确了六个重点建设的学科方向，即新闻传播理论与媒介批评、中外新闻传播历史、新媒体与新闻传播业务、传媒产业与传媒经营管理、海外华文传媒与华文传播、广告公关与营销传播。除此之外，学院还将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努力把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华南学术重镇，媒体精英摇篮”。

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譬如，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开展高层次的科学研究，进行高质量的学位点建设，推动深层次的教学改革，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涵。其中，科学研究上层次、上水平尤其重要，因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主要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高质量的学位点建设必须以高层次、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与科研成果作为支撑，深层次的教学改革也必然以科学研究的进步作为根基与动力。因此，大力推进上层次、上水平的科学研究，便成为摆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面前的历史使命。

在推进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领导，组织团队，争取项目，协同攻关，力求重大突破；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学者的自主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许多重要的成果不一定出自“规划项目”，而往往出自学者的自主研究。鉴于此，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力提倡多样化的研究，不仅鼓励积极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而且支持学院教师进行富有学术价值的自主研究。

为了相对集中地展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的各种研究成果，学院决定推出“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陆续出版学院教师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论著。开放、多元、丰富的研究主题，将统一在“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的开拓与创新之中。

2008年，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50周年与复校30周年，也是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重建30周年。在这个时刻推出“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应当说具有令人充满想象与期待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相信，“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不仅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是学院在新的起点上迈向更加辉煌未来的重要见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董天策

2008年3月

序

当初与李洁商定做这样一篇博士论文，固然与之兴趣有关。她原本有中文背景，好像不做点与文化一类相关的东西难显所长，同时也可以耍一下文墨才情，做导师的自不可拂她所好。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共同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强烈好奇心：为什么像英尼斯、麦克卢汉这样的学者是出在加拿大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这一批学者之间又有何异同？

这就必然牵涉到惯有的生平背景，可是我希望她更多是遵循曼海姆的“思想的社会学概念”路径，来“理解具体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尽量展现其外在内在的不同面向，并由此发现思想如何为“社会中正在成长的事实所预先限定”，同时，思想又是如何试图在继承中创新，以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①，切忌化约为因果式的“决定—反应”。李洁自己在论文中声称的“知识社会学”取向，即此之谓。

就现在论文看，李洁还是比较好地贯彻了这一研究宗旨，至少对于英尼斯、麦克卢汉思想形成的方方面面，有了较为完整的展现，并在这个基础上，梳理归纳了两人的基本观点及其意义。可以这样说，这是目前国内关于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的。我深知她为此付出的艰辛。写作过程不谈，单是资料的寻找和文章框架、纲目的构思，就搅得她寝食难安。记得预答辩时，由于长时伏案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她是被搀扶着一步一挪而来，就是那样，仍然没能躲过我对她论文的横枪竖炮，事后她是眼含泪花起身的。虽然我装作看不见，但心里也是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不知道她已付出的努力，也不是不理解她身上的病痛，只是学术归学术，身体归身体，不能串在一起。就她而言，博士论文既是学生时代的终结却又是学术生涯的起点，写作过程中的要求将对其往后起到决定性影响，容不得马虎。从长计议，不狠狠心又能如何？

作为论文最早的一个阅读者，我在李洁论文中已是受益颇多，尤其是对加拿大与

^①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黎鸣, 李书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

英尼斯他们研究和思想的关系，比之过去有了更为切实的理解与把握。玛丽·维庞德（Mary Vipond）曾这样说道，加拿大不是一个出于民族主义理由而创立的国家实体，其联邦体系十分松散，是一个“不易确认、不易管理也不易想象的国家”，于是永不停息地寻找自身特征，成为其一条“文化主线”。“加拿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甚至包括企业家们持续不断地、有时几近绝望地寻找加拿大人共同的纽带”，从而共同建构了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说是神话：“加拿大是一个建立于并且仍将依赖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国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强盛，此种传播与民族想象的构建，又与如何抵制美国影响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一种“加拿大式的技术偏爱主义”，即相信传播技术的神奇力量可以创造和保卫这个国家，就这样居于其整个政治和文化思想的中心。^① 传播技术之所以成为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注的首要问题，摆在这样的线索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二人切入的角度乃至对技术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差异。李洁以“共同体”作为文章落点，也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和考虑。

于是，不免就联想到了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格尔兹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不仅指其有特定的“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本地认识”和“本地想象”的交织中，法律就不可能是一种冷冰冰没有区别而且标准化的“机敏的手段”，相反，“乃是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②。在这里倒不是要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辨析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传播研究及其思想所具有的那种地方特色，这在李洁论文中已占有不少篇幅，依照麦克卢汉概括，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③。这虽然说的是英尼斯，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由地方性知识勾起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传播研究又该如何建构自己的“地方性知识”？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迄今为止的“传播学本土化”作全面反思和评价，虽然在我看来这已是刻不容缓。与英尼斯们的研究及“地方性知识”相关，只想提出一点，所谓的“本土化”绝不是功能观层面的概念、行为或者效果归类，而传播学的本

① 玛丽·维庞德. 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 郭镇之译.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5

② 格尔兹. 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 邓正来译. 载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 北京：三联书店，1994. 73～171

③ 麦克卢汉序言. 见英尼斯. 帝国与传播.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

土化恰恰掉入了这样的泥沼还不自知。凭借“传播”一词去寻找古代文化中的“传播”，或者搬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已有理论，来分析验证中国，实际就是以中国的现实来验证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大致就是其基本表现。从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路数看，缺少的正是格尔兹所说的“本地认识”和“本地想象”，甚至忘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朴素的道理。既然如此，根本不能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内在机理，发现并阐释其意义，导致“传播”研究成为既无历史纵深感又缺乏文化现实感的概念、词语及其方法的操演也就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看，李洁论文中所展现和揭示的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可对于我们现实的传播研究，实在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若从治学角度，似还应加上思考到老。因此，任何文章或专著，都只是代表一个阶段性的水平和能力，总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不可能十全十美。就现在看来，李洁论文中的不足也是难掩眼目的。比如整个逻辑主线略有点弯扭，对于麦克卢汉的分析稍显薄弱，最后的总结概括理论高度不足等等。好在李洁有优势，年轻聪明有悟性，又具备了现在这样的基础，只要沉潜下去，多加磨炼，将来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无论是继续现有的课题还是另转阵地。我对年轻学者们的“年轻”很是羡慕甚至有无可奈何的“妒嫉”，因而对于他们的以后也总是充满很多的期望和期待。对李洁当然更是如此。

黄旦

2009年6月19日

总序 / 001

序 / 001

绪论 / 001

第一章 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解读英尼斯、麦克卢汉的新视角 / 005

第一节 英尼斯、麦克卢汉生平简介 / 006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014

第三节 英尼斯、麦克卢汉技术思想研究的新视角 / 020

第二章 “技术民族主义”——加拿大国家历史与社会文化中的传播技术思想 / 029

第一节 传播技术缔造的国家 / 030

第二节 追寻中的“加拿大共同体”

——“一战”后加拿大社会状况与学术思潮 / 034

第三节 加拿大技术文化的悖论 / 040

第四节 传播技术与民族共同体：抹杀？超越？ / 046

第三章 英尼斯：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传播研究 / 056

第一节 媒介与坍塌的民主共同体——英尼斯的传播思想 / 057

第二节 权力的技术——从经济史研究到传播研究 / 063

第三节 传播研究中的制度主义方法论 / 070

第四节 追寻西方文明变更的轨迹——20 世纪文明史研究谱系中的英尼斯 / 082

第五节 借学术之手，补文化之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英尼斯 / 088

第四章 麦克卢汉：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 092

第一节 媒介与重建的心理共同体——麦克卢汉传播思想 / 093

第二节 语言达成交流梦——语言与文学批评中的媒介思想 / 099

第三节 控制心灵的媒介——麦克卢汉的广告研究 / 105

第四节 媒介技术的乌托邦——麦克卢汉与美国技术思想 / 110

第五节 完美媒介与宗教共同体理想——作为天主教徒的麦克卢汉 / 115

第五章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的传播技术 / 120

第一节 摧毁共同体 VS 重建共同体——英尼斯、麦克卢汉技术与共同体思想辨析 / 121

第二节 传播学脉络中的英尼斯与麦克卢汉 / 132

第三节 “文化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英尼斯、麦克卢汉研究取向的学术史辨析 / 150

结 语 / 156

参考文献 / 170

后 记 / 180

绪 论

2008 年，上海，一个人的一天这样度过：

清晨 7:00，在闹钟的音乐中起床，打开收音机，一边听新闻一边洗漱吃早餐；8:00，逮着等地铁的时间买两份报纸杂志，头版标题为“Web 2.0 时代之到来”；8:40，走进上班的写字楼，电梯口的液晶电视闪烁着斑斓的广告；9:00，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先通过 MSN 与国外总部的设计师讨论中国电信 3G 的进程，接下来用手提电脑和投影仪向老板介绍项目实施现状；12:00，午饭时间，被同事用手机抓拍了几张滑稽照片，一回头到了公司，发现那些照片早已通过网络让同事们浏览了一番；趁着午休时间打开 e-mail，呵呵，在硅谷工作的大学同学给我发来一段播客，祝我生日快乐呢！对，咱得上淘宝网购物一番来犒劳自己吧……下午 1:30，继续上班，别忘了要将技术图纸传真给深圳的客户，趁经理不在，赶紧上网下载一些最新的原创小说；5:00，临近下班，公司内手机声与座机声齐响，疲惫态共放松态一色。6:00，一边听着 MP4 一边回到家，住宅小区门口，数字电视公司正在拉着横幅搞免费装机顶盒的优惠活动，嘿嘿，我们都私下里安装了非法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谁还有兴趣？吃过晚饭，看看电视，新闻过后咱是看纪录片还是电影频道？哎哟，七十多个频道光换一遍都嫌累，要不还是看 DVD 吧，不是刚在楼下买了张最新的大片么？深夜 12:00，写完我的 Blog，走到阳台上，远处熠熠生辉的是这个城市的新市标——东方明珠电视塔，光芒四射地刺向墨蓝色的夜幕……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森伯说道：“‘近代人面对着他自己’这句话最适用于这个技术的时代。以前各个时代里，人类觉得它所面对的只是大自然本身。……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类如此彻底地改造过的世界里——我们总会遇到人工造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遇到的只是我们自己。”^①

我们生活在技术建造的世界中，宛如相忘于江湖的鱼儿，我们的生活没有技术将

^① W. 海森伯. 物理学家的自然观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0

意味着虚无，不过诚如哲学家所言，技术也将我们带上一条“不归路”，这条路的尽头未必就不是虚无。传说中的兰陵王借助面具克服生理上的弱点，最终却无法接受摘下面具后的本来面容。也许，面对技术与社会交织而成的种种悖论，那句“上帝究竟干了什么”似乎大有改成“技术究竟干了什么”的必要。技术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但长久以来局限于近代以来主客体两分的哲学意识，人们对技术主要作工具论和人类学的理解，其文化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特性一直被视而不见。正如著名技术哲学家 E. 卡普所言，人类的历史实在是一部利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历史。19 世纪中后期，西方著名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深入思考技术的本质问题。海德格尔率先对技术本质作了新的阐释，视之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认为技术就是人的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把它放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阈中进行深层次解读与阐发。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看来，每一种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了人类的感性生活，构造出不同的组织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人的社会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表现。进入 20 世纪后，技术影响人类社会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日益凸现，事实上，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因”的技术“一旦深入社会，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之中。每当社会开发出使自身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变，以适应那种技术的形式”。而我们正身临其境的“第三次浪潮”，其最大特征在于将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特别是聚焦于人们信息和思想的交流传播。在技术变革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今天，技术在实现人类对生活种种美好理想的同时，也把我们推到更大的交流困境之中。例如，在各种最新的信息技术宣称将会弥合世界经济差距的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着“数字鸿沟”；在互联网试图为人们扩大社交生活和精神交往空间的同时，我们发现它往往更加恶化自己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当林林总总的多媒体技术让人们以为“寓教于乐”即将唾手可得之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中，不愿回到真实的人生中来；当通信技术伴随着各种专业的沟通、谈判技巧一起推陈出新，民族争端、国家冲突、文化分歧同样日益升级……彼德斯指出，正是“新技术及精神上对新技术的接受”导致“交流传播”“既是桥梁又是沟壑”^①，技术自身也就陷入既是医生又是病人的矛盾状态。

于是，下列问题越来越引发我们的思考：在技术的迷阵中，应当如何解读技术？

① 彼德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4

如何理解它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双刃剑角色？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相互交流是愈益畅通还是日渐阻塞？我们是一步步靠近自己的生活理想还是与之渐行渐远？

在传播研究领域，传播学研究者对于媒介本身的研究是不重视的，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五要素而言，对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研究非常多，而传播渠道即媒介本身却几乎被忽略，西方世界从未有过关于技术变革引发心理变化的理论出现，除了英尼斯及其同仁麦克卢汉的著作。这里所说的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开创的技术学派。前者与四五十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传播学行政研究相颉颃，第一次对传播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将传播技术的变迁、媒介形态的更迭与利益结构、符号体系、社会制度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文化生成过程，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性研究模式，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①。紧随其后的麦克卢汉更在人类对文化、媒介与传播的理论革命中成为关键性人物，把传播的媒介技术本身看作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了以“媒介即讯息”为核心的理论，将焦点放在传播技术及其特征上，试图揭示出现的各种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揭示传播技术本身（而不是传播的内容）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唤起了人们对于媒介本体的关注，开创从传播技术视角考察、研究传播的传统。二人所依托的“多伦多在一段时期内曾堪称世界知识中心……在此地，一种全新的理论宣告诞生，这一理论将传播置于人类文化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地位”^②。英尼斯、麦克卢汉以降，詹姆斯·凯瑞、保罗·莱文森、德里克·德克霍夫、尼尔·波兹曼、马克·波斯特、梅罗维茨、沃尔特·翁等人从不同的层面对传播技术展开更广泛的思索，形成了西方传播学的技术文化研究的学术集群，这一研究传统为我们充分认识各种媒介带给人类文明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与方法。

概言之，英尼斯、麦克卢汉与其继承者们在研究视野、路径取向、研究方法上彼此维系和呼应，一反传播学界的旧思路，开创了从传播技术视角考察、研究社会的独

①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18

② Derrick de Kerckhove, McLuhan and the “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9 (4).

特传统，从媒介的视角建立起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分析模式，为我们充分认识各种媒介带给人类文明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在他们看来，传播技术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理认知模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决定着人类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的形成、发展与变异，因此一个时代的标志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媒介，一部人类史可以根据传播技术的发展进行梳理。如此一来，如何审视技术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之间复杂的纠葛？如何思考媒介与交流的种种关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和研究基础。

第一章

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解读英尼斯、麦克卢汉的新视角

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费正清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s Community?
—From Innis to McLuhan

第一节 英尼斯、麦克卢汉生平简介

在很大程度上，英尼斯被视为加拿大学者的象征，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被称为“加拿大经济史之父”，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直至今日，多伦多的圣·乔治大学仍矗立着他的铜像，旁边的石碑上撰写着他的生平，多伦多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学院。

1894年，英尼斯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南诺维奇镇一个清贫的农庄家庭，他的成长几乎与加拿大的现代化历程相伴随行。在这个“世界老年时候孕育的一个年轻国家”中，各种最新的交通、信息系统和传播技术迅速改变着他身边的一切：2岁时，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7岁时，无线电通信在加拿大出现；从11岁开始，英尼斯每天清晨7:00都要乘火车前往中学上学，他总是喜欢去吸烟车厢待着，因为这里聚集着各具特色的人物，闲聊着他们千姿百态的人生故事。^①也许正是从这时起，交通技术在他看来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新思想与新生活的符号。真正意识到铁路对祖国的重要性则始于1915年，他在大学期间为生活所迫，前往西部的曼尼托巴省参加一项为期5个月的支教活动。通过这段经历，他对加拿大的西部、西部与整个联邦的关系等均有所了解，并对交通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英尼斯的父亲是英国移民的后代，母亲则是苏格兰移民的后代，他们与周边的人们一样，都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父母期望英尼斯成为教师或者牧师，英尼斯从学院毕业后在当地中学担任了两年教师，以筹措下一步的学费。他于1912年前往多伦多，进入麦克马斯特大学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浸礼会教友子弟的教会大学。英尼斯主修历史与政治经济学。

“一战”爆发后，面对周围同学排山倒海的参军热情，英尼斯加紧进行自己的学业，到1916年基本完成所有课程之后，他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决定报名入伍。对他来说，“一战”是个非常简单的道德问题：作为基督徒，他不能逃脱自己应尽的义

^① Harold Innis, Memoir of Harold Adams Innis Covering the Years 1894 - 1922 [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2).

务。他生长在一个严苛的福音派社区，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上的大学提供的也是与上述教义一致的自由教育。德国违反了和约，试图欺凌其他国家，如果不受到惩罚，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基督教徒的希望终结了，正如他所说：“如果我对基督教没有信仰，我不会应征入伍。”^① 对英尼斯而言，“一战”在人生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仅次于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在那之前，受到家庭严格的清教徒生活和宗教约束，青少年时期的他秉承传统信念，孜孜献身于学习与农庄劳作。而“一战”参军后，他毫无准备地陷入了一种急剧动荡的生活，充满暴力、恐惧与危机，因此，终其一生他都痛恨战争和强权。战争带来的冲击还包括他亲身感受到的英国军官的歧视，初次走出国门的英尼斯第一次对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尴尬身份有了切肤之痛。英尼斯担任通信兵，学习了摩尔密码和旗语。在“一战”这场现代战争中，从战马到飞机，从信鸽到无线电，各种运输与传播技术一起上阵，也许这是传播技术第一次在英尼斯的记忆里烙下如此直观的印记。

1917年7月7日，在著名的维米战役中，英尼斯和其他几名信号兵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被德军的炮弹击中大腿。多伦多大学档案馆保存着他当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的弹痕触目惊心，其实正是这本放在髋部口袋里的笔记本救了英尼斯的命。他随后被送回英国 Basingstoke 的加拿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有趣的是，这所医院正是多伦多大学促成和资助的产物。^② 在英国养伤的英尼斯丝毫没有浪费时间，通过导师 McGibbon 的信件指导，他撰写了题为《加拿大士兵的心理》的硕士论文，对500名士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籍贯、入伍前的工作、战后的打算、对战争的看法等。他还阅读了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内的大量经济学经典著作。^③

1918年夏季，英尼斯因伤回国并退伍，很快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他将律师作为首选职业，却放不下对经济学的兴趣，这也许是受到他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时 W. M. Wallace 教授的影响。Wallace 认为：“对历史的经济学阐释并非唯一阐释，但却是最

① Donald Creighton, *Harold Adams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7, p. 30.

② Martin L. Friedland,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 History*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p. 258.

③ Harold Innis, *Memoir of Harold Adams Innis Covering the Years 1894 - 1922* [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2).